

◀ （上接 9 版）

归到词汇学。如此一来,词汇学下的定义就和裘先生的理解不一样,不过后来也没引起什么争议。至于更深层次的影响,这不是短期就能显现的。我不能做太多的评价,还是让学界自由评判吧。

语言学带了个头,其他社会科学也要做名词审定,就过来找我们取经。比如我们院的社会学所,他们难度就很大,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学偏向于自然科学,相对中性。哲学所的工作也不好做,国内外的术语体系不一样,同一个术语更容易会产生不同的理解。尽管如此,由于院里十分重视这项工作,所有的研究所都要开展,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工程。

在引入现代语言学以前,语言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,叫小学,分为文字、音韵和训诂,基本对应了文字、语音和语义。但是语法这一块就比较薄弱,没有词法、句法这样的西方概念。19 世纪末,出了一本《马氏文通》,用了很多中国的文献材料,而语法照搬了西方。语法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大门类,研究的人多,各个门派都有。曾经我们把西方理论视为禁忌,现在则要提防另一种倾向,即用西方的研究结论来替代汉语中出现的实际情况。术语中国化,名词审定在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工作,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。比如字本位的语法,最早可以追溯到赵元任先生,他一辈子研究汉语语法,认为字很重要,说我们应该多考虑字的问题。后来北大的徐通锵先生提出字本位,华东师大的潘文国先生专门写了关于字本位语法的书,但目前还没有成为定论。字在语言学的哪个层次,这个界定很复杂。字兼不同的语言成分,它可能是语素,可能是词,有时一个字就是一句话。

包括语言学在内,社会科学领域的名词审定不至于有很强的约束力,换句话说,是有弹性的。如果也像国家标准、部门标准那般严格要求,就会陷于被动,也不客观,我们不会有这种期望。

“我的理解是,名词审定在辞典类型的成果之上,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”

周荣耀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）：
我对于名词审定的最初了

解,应该是自然科学。人文科学有它的特殊性,难以处理,在吸取了一些经验后才开始慢慢地起步。2008 年,名词委希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可以陆续开展名词审定工作,但是学科太多,组织起来繁琐。他们就想到中国社科院,有了统一部署,推进起来就会容易不少。科研局找我们谈,说要做这个项目时,我们心里不是非常乐意。一方面是当时的认识不清楚,兴趣也不大,以为和编辞典差不多,而辞典作为科研成果在社科院很难排上号。现在都说创新,编辞典还能怎么创新? 另一方面,涉及的人员比较多,一个人肯定没办法做。后来认真看了工作文件和审定要求,意识到这和想象中的编辞典有很大区别。我的理解是,审定工作的高度是在辞典类型的成果之上,看这些名词是否准确,是否具有科学性,相比辞书编纂,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。考虑到这一点,想法就改变了。

听完汇报,大家都表示要把这项工作当成一个重要课题来做,名词委和院里商量后,制定了一整套的程序和要求。在和其他几个所一起开会时,我一下子感觉到,虽然大家都是人文社会科学,但比较而言,世界历史这个学科的名词更难处理。说得通俗一点,世界历史的界线没有“框死”,什么内容都能往里面装,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名词。大家去翻翻世界历史的教科书,哪个时代会忽略重要的科学技术进步。纵向看,从古至今,时间跨度相当长;横向看,不管哪个学科,只要是历史上被人们认可的,都能被收录。问题是,不同学科的名词重复了怎么办? 别的学科还没做,我们先做了,他们怎么办? 科研局和我们沟通时就说了,“周老师,首先考虑的是世界历史应该做哪些,您不要管别人,想太多了就会束缚手脚。”

根据工作要求,我们成立了名词审定的课题组和专家委员会,大家集思广益,一起讨论。哪些名词应该收,学科里的名词应该如何分类,并形成了明确的意见。当时有一个问题讨论了很久,人名和地名收不收? 我的第一反应是没办法收,世界历史不是一个筐,假设最后出版 5000 个词,把重要的人名地名都装进去的话,可能会占掉一大半的篇幅。最后的结论是,纯粹的人名地名不要,因其不构成学术意义,也不在科学技术的范畴之内,但是涉及到人名地名的学术名词要收。举个例子,“斯大林格勒”是地名,我们不收,收的是“斯大林格勒战役”。当初设计结构时费了很多脑子,有些是全球性的

名词,有些是地区性、国别性,那么框架怎么处理? 后来的想法是做综合,古代这部分集中起来,不考虑东南西北,后面再划分美洲、欧洲、拉丁美洲、亚洲、非洲。在翻译英文名词时,我们主要参考新华社出版的地名译名对照表,对于不常见的名词,有现成的译法就采用,没有的话就根据自己的感觉来翻译,力求通俗一点。

接手这份工作时,我有一些想法,比如参与课题组的人不能多,凡是参与者都要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,可以做事,年纪不要太大。我不是看不起老专家,而是指挥不了,名词审定的任务有时间要求,你让我成天盯着他们交稿,那真是要了命了。归结下来,我们需要能喊得动的人,一般是所里四五十岁的副研究员（为了保证质量和效率,在审定工作完成前,限制课题组的人员申请其他课题),而审定委员会必须由重量级的人员组成,基本上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世界史领域的专家。这样一来,运转比较顺畅,但也会碰到问题,这与社会科学的复杂性有关。选定一个名词后,往往会有很多种解释,面对分歧,如何解决? 审定一个名词,我们会把各种与之相关的论述拿出来比较,有明显差别的要单列,进行专门讨论。之所以要慎重,是因为名词审定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。

第一批名词出来后征求意见,对于“日本法西斯”这个词,一个在同龄人中比较拔尖的中年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。他说这是虚构的名词,我为此专门作了一番解释。“二战”又被称为“反法西斯战争”,从逻辑上讲,中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战胜国;“法西斯”这个词发展到今天,要有历史的观念,现在“日本法西斯”的提法比较少见,但翻翻过去的文献就有,一些老区的山墙上还留着“打倒

日本法西斯”的标语。时至今日,“日本法西斯”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。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也有区别,在我看来,种族优越感、到处抢占生存空间,这些特点是一样的,所以我坚持要留下这个名词。当然,对于同行们的不同意见,既要谨慎判断、仔细推敲,也要积极学习、善于吸收。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时间和地点,再加上历史观的差别,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,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
人文科学反映的是认知问题,肯定会有不同看法。面对存有较大争议的名词,我们一般是回避的,尽量不收,否则只能把各种看法都罗列在一起,这样才显得公允。当然,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,可供参考、比较的数据就越多,因此更容易形成一种共识。

做完了世界历史的名词审定,我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性有了更清晰的思想认识。在大的历史学的范畴下,世界历史算是比较年轻的学科,与考古、中国史都不能比。依据原先的学科划分,世界历史是历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,现在升级为一级学科,这说明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看法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。

“名词审定关乎科学研究与日常生活，让国家的政策制定有了更多依据”

陈杰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）：

在自然科学领域,医学是一个比较大的门类。过去学医时讲“三理一剖”,即生理学、病理学、药理学与解剖学,我从事的是病理诊断,迄今有 40 年了。病理学是干什么的? 很多人一开始可能不清楚,现在慢慢有了认识。举个例子,我们每周一次 MDT,即多学科综合治疗

(multi-disciplinary team)。面对一个病人,十几个科室在一起讨论,临床表现很像某种疾病,但仅仅靠影像学来判断是不够的,还需要有病理的证据,确诊以后才能制定治疗方案,所以有人说我们是“大夫的大夫”。

记得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,我买过一本医学百科的书,里面都是基础的医学名词,收录的病理名词很少。前些年,启动了病理学名词审定工作,光是确定范围就花了很长时间,走了很多弯路,因为和病理沾边的名词太多了。大家的看法是,范围不能过宽,也不能过窄。过宽就把跟医学有关的词都收了进来,显然不合理,过窄则把属于自己的名词拱手让给别人。经过取舍,病理的基本名词是两三千,将来修订时还会继续增补。审定过程中,我们会参考世界上公认的医学专著,像美国的外科病理学、世界卫生组织的肿瘤分类,以及其他一些经典的教科书。

我们邀请了一大批全国有名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,有北京的(协和、北医、301 医院),上海的(复旦)、浙江的(浙大)、四川的(华西),等等。按照我们的设想,审定病理学名词是为了规范学科术语,避免出现名称翻译和使用的混乱。临床的病名与组织胚胎的概念不太一样,后者喜欢用“成某某细胞”。“纤维母细胞”(fibroblast)长瘤,我们说是“纤维母细胞瘤”,组培那边把 fibroblast 翻译为“成纤维细胞”,如果对应起来叫“成纤维细胞瘤”就很别扭。再比如“神经母细胞瘤”的说法用了几个世纪,现在改为“成神经细胞瘤”。病理学对临床的影响比较大,不像解剖或组培的名词是规定好的,病理确定了是什么疾病,临床就跟着采用一样的名词。

根据中华医学会的安排,每个学科各自编一本名词,这样做就会出现很多重复。我们在开会时就提了意见,但在目前的情况下,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重复的名词在不同学科下面,表述会不一样,比如“肿瘤”,病理和外科关注的侧重点不同,解释也就有了区别。

谈及医学名词审定工作的重要性,这一点毋庸置疑,关乎国计民生。拿医保报销来说,如果病名不一样,肯定会到处碰壁。现在要做医疗大数据,没有规范化的名词,那么未来产生的数据都不可能形成真正有用的大数据。但是反过来,在完成了名词审定后,无论科学研究、日常生活还是国家政策制定,就有了更多依据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统一的名词,这是基础性工作。 ■



从事病理学名词审定时的部分参考资料